

现代性与农村生态危机：“断裂”的视角(1949—2012)

——基于云南省M县四村田野调查

耿言虎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与现代性因素的扩张密切相关。传统与现代“断裂”是生态危机重要的分析视角。本文通过对云南省M县的田野调查,阐释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机制。研究表明,“中心化”的现代资源管理制度代替地方依靠传统社会规范和信仰禁忌的社区自我管理、以追求产量为目标的汉区农耕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先后取代地方传统的农耕方式和地方知识、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产业通过“自然资本化”逻辑取代传统生存导向型农业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需要对现代性和断裂予以深刻反思。

关键词:现代性;断裂;生态危机;地方性知识;自然资本化

中图分类号:C91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5-0017-08

一、农村生态危机:现代性与“断裂”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在发展主义话语和现代化推进下,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发展”的实质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以“社会主义”前缀为表象,在实践层面上的一种非政治性、技术性的现代化。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核心^[1]。可以说,中国农村发展的本质是现代性因素及其扩张。但是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以生态危机为代表的“类发展困境”^[2]日益突出,森林破坏、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农村面源污染等愈加严重。严峻的生态危机成为农村持续发展的瓶颈和社会矛盾的“导火索”。现代性与生态危机如此“并驾齐驱”“形影不离”,这二者有何内在关联?

本文认为,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断裂”是农村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传统与现代的“断裂”(discontinuity)是社会学争议的重要话题。吉登斯认为需要解构线性进化的发展史观,认识到传统与现代必然性的“断裂”,主要源于以下三点:(1)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2)现代性席卷全球的变迁范围;(3)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在环境领域,“断裂”引发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尤为突出^[3-4]。

自“工业革命”以来,新兴的工农业生产方式、自由市场、知识体系带来社会的急剧转型,自然被重塑。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如下三类:(1)工农业断裂与环境。现代社会特有的工农业生产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工业生产方面,政治经济学派如“生产的跑步机”理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5]、“增长机器”理论^[6]都阐述了与传统生产方式迥异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与生产体系的运行逻辑,环境破坏正是这一政治经济体系运转的负面后果;农业生产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壤持续性问题,批判其对土地肥力的掠夺^[7]。福斯特·贝拉米的“生态断裂”^[8]、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9]等深化了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研究。(2)“脱嵌”市场与环境。孕育于现代社会的自发调节的市场与生态危机有直接的关联。波兰尼指出传统时期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是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人类的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但19世纪后,市场摆脱了社会的制约,“脱嵌”的市场将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卷入资本的增殖活动,造成生态恶化^[10]。反思市场的理论研究还包括埃斯科巴的“自然资本论”^[11]。张玉林则通过“政经

收稿日期:2013-03-11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2_0220)

作者简介:耿言虎,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

一体化”逻辑阐释了中国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合谋与环境危机^[12]。(3)知识断裂与环境。知识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认知,传统时期的地方知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整体观,人要适应自然、遵从自然规律。然而,现代的、全球的、科学的知识实现了对传统地方知识的替代,而“新”知识主张规训自然,把自然客体化、资源化、资本化。知识断裂是环境危机背后的文化根源。主要研究包括:雷蒙德·墨菲的“理性与环境”(rationality)^[13],巴里·康芒纳的“技术批判论”^[14],陈阿江的“社会失范论”^[15]等。

二、田野调查点介绍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区域位于云南省西南边境 M 县。选择 M 县作为田野点有以下原因:首先,M 县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县,开发较晚,数千年以来都是较为封闭的区域。1949 年以前,M 县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封建土司政权。M 县居民主要以傣、佤、拉祜等少数民族为主,面积 1893.43 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13.55 万。M 县是以山区为主,谷坝相间的复杂地形^[16]。地形较平坦的地方叫做“坝区”,除了坝区以外,主要是山区和半山区。解放以前“坝区”为傣族居住区,以水田稻作为主要农业方式,山区、

半山区的佤族和拉祜族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其次,1949 年以后 M 县生态发生了急剧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49—1982 年,由于森林滥伐和毁林开荒,致使森林覆盖迅速下降,动植物消失、水土流失等问题不断出现。森林覆盖率从 1949 年前的 65% 下降到 1981 年的 34%。第二阶段,市场化下的生态问题。1982 年以来,M 县政府提出“胶糖茶”主导的绿色产业发展政策,森林覆盖率迅速恢复到 60% 以上。以橡胶、甘蔗、茶叶、桉树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迅速绿化了 M 县山区。但是,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成为新的问题。可以说,60 余年来 M 县急剧的社会与生态变迁是考察断裂性与生态关联的极好案例。本文选取调查地村落的森林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和绿色产业作为研究透镜(Lens),以聚焦本文研究主题。

田野资料基于笔者在 M 县 4 个行政村的调查,调查点基本信息参见表 1。第一次田野调查于 2010 年 3—4 月,调查时间 28 天。第二次调查于 2012 年 7—9 月,调查时间 50 天。主要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方法收集资料。本文的经验材料均为田野调查所得。此外,还有 M 县县志以及县档案馆、统计局等机构获得的相关文献资料。

表 1 四个行政村的基本情况

村庄 ^①	面积(平方公里)	主体民族	人口(人)	地形	历史农业方式	主导经济作物
勐村	49.35	傣族	4170	坝区	水田稻作	茶叶、香蕉
帕村	102.03	拉祜族	5013	山区	刀耕火种	咖啡
腊村	109.99	拉祜族	1981	山区	刀耕火种	咖啡、桉树
双村	36.15	佤族	3385	山区	刀耕火种	橡胶

数据来源:《M 县统计年鉴 2010》。

三、森林资源:“中心化”管理与社会失范

资源管理的“中心化”转移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森林、河流、草原等自然资源管理权通过“国有化”,设立自然保护区等方式由地方社区上移到政府管理机构。自然资源管理的“中心化”趋势与现代国家权力的下渗以及国家对资源的控制目标^②紧密相关。但是,资源“中心化”管理具有严重的弊端。资源管理的“中心化”意味

着地方社区被“去权”(disempowered),传统时期行之有效的社区资源管理制度被取代,同时,依靠政府机构的“自上而下”管理具有先天痼疾。下文将详细阐述。

M 县的山地面积占全县的 90% 以上,森林资源极其丰富,解放初期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65%。解放以前虽然没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森林所有权,但是在森林使用权上有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形式:①头人(土司、地主)占有;②村寨占有;③竜山(风景林)占有;④坟山占有;⑤无主林、荒山、荒地^③。其中,“村寨占有”比重最大。村寨所有的林

① 按照学术惯例,村庄名称均已做相应的技术处理。
② 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殖民地国家,殖民地政府通过“国有化”的方式将资源控制权从地方社区剥夺,政府管理下的资源被大量廉价运往宗主国,造成了地方社区和政府持续不断的冲突(参见 Guha, 1989)^[17]。
③ 云南省林权工作组《关于 M 县林权调查情况及会议处理意见的报告》。M 县档案馆,1962。

地,按照功能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傣族勐村为例,分为竜山、坟山、水源林、用材林、柴山。森林资源的保护依赖两套系统:其一,森林管理制度。用材林的砍伐需要向“布改”(傣族寨子首领)报告,即砍伐用途、数量等,并需要缴纳一定的管理费。如果超量采伐,“多砍一棵,罚种十棵”。据老人说,以前惩罚措施相当严厉,一般人不敢违反规定。这种传统的森林管理制度依靠地方首领的传统权威和社区社会资本如互惠信任、集体监督等,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其二,信仰禁忌。竜山是傣族、佤族等当地民族的神山,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竜山。对傣族来说,竜山上的菩提树是“神树”,大青树是“鬼树”。信仰佛教的傣族人会在节日上山香许愿,他们对竜山保持着绝对的敬畏之心。“别说在竜山上砍树,就是枯树枝也没人敢拿”,当地人认为砍竜山树会“遭报应”“得病”。竜山禁忌对森林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出,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的假设前提——“没有管理的公有地”(The Unmanaged Commons)^[18]在当地并不存在。

1949年后,M县森林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砍伐,毁林事件频发,森林滥伐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一份M县县委调查组1961年对发生于帕村“毁林”的调查报告部分地揭示了森林破坏的原因:

“解放以前群众对乱砍伐森林规定过罚款制度(乱伐一棵罚款一元),对于当时保护森林起到一定作用……历史上一望无际的乔木林,自从部队营建起经历过4次大砍伐(部队营建、机关建设、修筑公路和大炼钢铁),没有注意到更新和加强保护工作,如今这些松树已变成稀疏的山林,跟着附近各个寨子群众也开始了乱砍伐。56年以后县上曾把国有林分片管理,但是这种管理办法是由上而下套下去的,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讨论,分片管理仍失效……过去群众管理山林的有效制度废除了,新制度不是从群众中来,结果造成了近年来我县森林受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小学教师没有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宣扬破除迷信,对竜林也进行了乱伐。”^①

以上材料揭示了这一时期森林毁坏的复杂逻辑。首先,国家权力下渗破坏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和信仰体系,导致森林管理严重的混乱与失范。解放后,M县农村“旧社会”的“头人”被作为“阶级

敌人”进行批斗,“头人”们或是逃到境外或者受到批斗,被以“贫下中农”为主的新领导层取而代之。传统社区的组织体系解体,依托于组织体系上的森林管制制度自然也就失效了。同时,部队、机关、学校等外来部门和群体的进入,并没有按照当地社区的社会规范利用森林,乱伐不仅严重毁坏了有形的森林资源,更加毁坏了无形的传统森林管理制度和村民传统的竜林禁忌观念,当地村民由传统时期的森林保护者转变为破坏者,也“跟着”乱伐。这与陈阿江对太湖流域水污染从“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的污染逻辑转变历程的研究相似^[19]。传统的管理制度和信仰禁忌双双失效,以规范失灵和规范真空为表征的社会“失范”有力地阐释了森林毁坏社会原因。

此后的数十年,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自上而下”的森林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M自治县护林育林实施办法》将森林分为国有林、集体所有林以及私人所有林木。据统计,1981年M县国有林面积为47.97万亩,约占森林总面积的35%。^{[16][12]}M县相继建立国营农场、林场等机构,对资源进行管理和使用。1985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森林法》,森林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森林法》强调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森林管理和使用。1987年颁布的《云南省施行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若干规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森林管理机构、人员建设、资金制度。随着国家科层管理机构的完善,资金、人力的不断投入,国有森林管理中的“中心化”趋势愈加明显。森林资源管理的“中心化”过程基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产权理论。因此,在林业确权后,一套以国家科层机构(林业局、站)、法律为代表的现代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包括《森林法》及相关林业政策等相关制度以及各级林业局(站)、森林公安等相关机构。

资源“中心化”管理排斥非正式的社区传统制度,传统时期森林资源的保护者成为新制度监管的对象。资源社区管理的优势,如对资源熟悉的认知程度、监管的便利性、因生计依赖具有的强烈保护动机不复存在。^[20]“中心化”管理制度潜藏着管理风险:(1)信息缺失。资源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资源特征、边界和功能的清晰识别,这是准确决策的前提。资源特征的认知需要长期生活观察,受

^① M县县委调查组《关于林权的调查情况》,M县档案局,1961。

制于远距离、非本地化等原因,管理人员对当地资源特征的熟悉不够。(2)管理/执法力量不足。M镇林业服务中心共7名工作人员,要管理3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对森林违法管理基本上是“事件—应急”式处理。不断增多的森林违法犯罪迫使科层机构被动调整。2011年原属于M县林业局的“森林公安科”升格为M县“森林公安局”,以打击日益严峻的森林犯罪行为。(3)部门利益化取向。林业局为了实现林业经济效益,加大了对森林的开发力度。同时,地方森林法律的执行常常是虚弱的(weak)。近年来,反思“中心化”的资源管理制度成为学界和政府的热点,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CBNRM)的“去中心化”(decentration)改革受到关注,可以看做是对资源“中心化”管理缺陷的修正和传统的复归。

四、农业生产:外来知识代替地方知识

传统时期支配农业生产的是地方知识。1949年以后民族地区的农业史是一部农业改造史,是地方知识被具有话语权的外来知识所取代的历史。以“刀耕火种”农业为例,M县“刀耕火种”农业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阶段:汉区农业模式替代“刀耕火种”。为了提高农业产出,消除“刀耕火种”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1949年以后,政府一直试图以汉区农耕模式替代“刀耕火种”。第二阶段,科学技术融入农业生产。1970年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科技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变革力量。这两次改变对生态产生了难以低估的影响。

1. 适应性管理:传统农业知识的地方实践

传统知识来源于当地村民长期与自然互动而形成的“经验法则”,并且通过代际加以传承。与现代农业方式以追求持续的产量,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不同,传统的农业方式是一个以质量为目的的适应性管理,注重生态反馈,资源使用者不断调整行为以实现“生产—环境”的动态平衡^[21]。下文从“刀耕火种”农业演变历史讨论农业生产的“断裂”及其生态影响。“刀耕火种”农业以草木灰做肥料,以种植的空间转移换取森林的恢复时间,从生态视角看有自身的合理性。“刀耕火种”是一个复杂的农业体系:依据地表植被、土地状况不同,实行形式多样的轮歇技术。双村、帕村和腊村,历史上都以“刀耕火种”生计为主。这种农业系统中的森林、耕地具有较强的“转化—还原”能力。森

林经“刀耕火种”成为耕地,休息若干年又恢复为森林。山地民族“养山吃山”的一套地方知识保证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1)砍树技巧。砍树需要保留树木的根系,一般预留30~50厘米,以利于植被恢复和防止水土流失。(2)长周期休耕。以村落为生产单元,依托严格的社会规范,每隔1~2年换地种植。耕种地与撂荒地之比一般不低于1:5,即种1块地,有5块地在休耕。如双村有7块轮歇地分布在寨子的四周,按顺时针方向每块地种一年,7年循环一次。再次耕种时,森林已恢复为树木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密林。(3)挑选生长速度快的树种植。如傣族有在地里种“黑心树”的习惯,这种树生长速度快,越砍越发,可以保证被砍伐植被尽快得到恢复。(4)严格的“放火”管理制度。“炼山”不能烧到计划外的森林,这是佤族、拉祜族的生产禁忌。在放火时,树木四周清理出3~4米宽的“防火线”,线内一个树叶、草都不能有,以防止火势肆意蔓延。无人看管不放火、非轮歇地不放火、风大不放火。出现其他森林“着火”的情况,佤族要“杀牛”“杀狗”,以求神保佑不会有灾祸降临。以上措施保证了“生产—生态”的互利共生。

2. 外来知识代替本地知识

(1) 汉区农耕模式代替“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因“产量低”(旱稻平均亩产150斤左右)、“效率低”(大量土地撂荒)、“毁坏森林”,被话语权力建构为落后、破坏生态的生产方式。国家推行的农业改造按照汉区的农耕知识^①:在“人—地”关系紧张前提下,加强农业要素如劳力、技术与肥料投入,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增加产出。由于水田较高的产量,“开田”一直受政府鼓励。“农业学大寨”时期,M县政府制定了山区“人均一亩田”的目标,山区水田数量迅速增加。帕村老寨生产组解放以前只有不到20亩水田,1971年达到176亩,1978年增长到365亩。水田面积增加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但“农业学大寨”中“一刀切”式地开水田而不顾地形、径流等自然条件的限制,造成水土流失现象突出,“水冲毁田”事件频发。帕村老队长说:“那时候一场大雨就能冲毁很多田。被冲塌的田既不能种庄稼,也没有树,什么也不是了。”对生态影响最大的是“固定耕地”政策:政府希望以不轮歇、不抛荒、连续种植的旱地取

^① 汉区农耕知识以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为代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

代轮耕制度。“固定耕地”政策切断了“森林—耕地”系统转化进程,用作生态恢复的备用地——“撂荒地”的生态价值被忽视。由于连续耕种,杂草丛生,导致森林的不可恢复、水土流失、土壤肥力

下降,不得不开辟新耕地,形成恶性循环。轮歇地由原来的连续种植 1~2 年延长到 3~5 年,有的甚至达 7 年。而抛荒地只能是杂草和小灌木,无法长成森林。固定耕地反而加剧了毁林开荒(表 2)。

表 2 M 县历史时期农业产量、耕地面积和森林面积变化表

时间点	农业产量 (万斤)	耕地面积 (市亩)	原森林面积 (万亩)	森林覆盖率 (%)
1954	2136	104668	81(1959)	65(1959)
1958	2384	126000		
1961	2194	134557	48(1973)	44.1(1973)
1965	3652	152028		
1979	4569	222209	40(1980)	33.5(1981)

资料来源:《M 县统计历史资料(1949—1988)》,M 县统计局编印;《中共 M 县委、县政府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意见》,(1981)第(48)号。

(2) 科学知识代替传统知识

随着科学进步,农业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20 世纪 40、50 年代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的“绿色革命”就是以高科技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M 县自 1970 年代以来,随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逐步建立,以化肥、农药、新种子为代表的科学知识体系经政府推广而被农民所接受。1970 年代中期 M 县大力推广“两化”(化肥、农药)上山,化肥逐渐取代农家肥、“绿肥”。政府一开始推广化肥时,村民是抵触的,有些村民把政府免费送的化肥扔掉,却把化肥袋拿回家。但与传统农家肥相比,化肥对提高单产作用明显,逐渐得到农民的青睐,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急剧增长。以帕村为例,1975 年氮肥使用量为 4.4 吨,2010 年氮肥使用量增长到 317 吨。政府推广了新式作物品质,但是新品种容易生病,不得不打更多的农药。农民被动地接受了政府的农业改造,学习“科学种田”“科学管理”“科学养猪”……以“脱域”(disembedding)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通过象征符号、专家系统这些现代手段得以控制传统时期农民自身实践的农业生产,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逻辑如出一辙。于是,科学力量取代传统农业知识。

3. 知识替代的生态反思

与西方学者提出的“科学知识”替代“传统知识”,进而造成生态问题的一般路径有所差异,中国民族地区传统知识被替代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一种外来知识和权力结合的产物。正如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冲击在草原地区造成的生态危机类似,M 县汉区农耕知识对“刀耕火种”知识替代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汉区农耕知识以“土地”为核心,而“刀耕火种”农业以“森林”为核心^[22],前者以追求土地的最大产出(粮食)为单一目标,后

者追求产出和生态的平衡^①。同样,以提高农业产量为目标的科学知识具有强大的技术合理性,在短期内实现了增产的效果。但是,现代技术是以不断榨取土壤肥力,忽视可持续性为特征的,土壤肥力下降、农业面源污染是现代高科技农业的代价所在。

五、绿色产业:“市场导向”
替代“生存导向”型农业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市场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对农村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依托市场的自发调节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由直接控制转向宏观调节的结果^[23]。现代市场与生态有密切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是关键性的要素,依托于其增殖本性的运作逻辑,广袤的自然资源成为资本增殖的载体。橡胶、茶叶、甘蔗、桉树等经济林木迅速替代野生杂木树,荒山、荒地迅速实现“绿化”,过去 30 年间经济林木面积急剧上升(参见图 1),M 县的森林覆盖率从 1981 年的 30%,迅速提升至近年来的 60% 以上。“绿色产业”成为 M 县的支柱产业,农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调查的四个村都形成了“绿色产业群”:以 1~2 种经济作物为主,多种经济作物集群发展。例如,双村以橡胶为主,帕村以咖啡为主,蜡村以茶叶、咖啡为主,勐村以茶叶为主。

经济作物以何种方式迅速扩张呢?以“橡胶村”双村为例,橡胶扩张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① 实际上,单纯以粮食产量作为标准衡量刀耕火种农业系统,明显地低估了其产出。依托于轮歇地恢复的地表植被,如森林和草地,打猎、放牧是村民食物的重要来源。而这些往往被政府、农业专家所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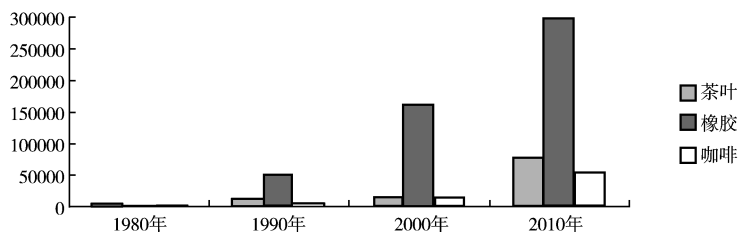


图1 M县主导“绿色产业”面积增长图(1980—2010)(亩)

段(1982—1990年末):政府主导橡胶种植。为了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从1982年开始,M县政府开始在双村大力推广橡胶树种植,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主导经营模式:公司投入资金和技术(育苗、芽接、开梯地、挖穴等技术培训和肥料),基地投粮(胶树幼苗成长期间胶农的口粮),农户投劳。在股份核算上,以10个劳动日=20千克原粮=20元人民币=1股的折算方式,收入按照比例分成。双村“包产到户”剩余的近2万亩“机动地”全部被规划为橡胶种植区。政府通过“技术员—生产队长、副队长—村民”的形式进行技术培训。每户村民种植橡胶不得低于20亩,不设上限。橡胶公司主导的橡胶种植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双村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第二阶段:市场刺激下村民自发种橡胶树(2000—2010年)。从2000年开始,M县橡胶市场的发育逐步完善,外地老板纷纷加入到双村橡胶的收购中,橡胶价格水涨船高,激发了村民橡胶种植的热情。双村村民意识到种植橡胶的巨大经济利益,纷纷将种植粮食作物的田、地改种橡胶树,甚至柴山也被种上橡胶,以往不具有经济收益的“超边际土地”都被充分利用。到2010年,双村36000亩土地全部种上了橡胶,双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橡胶村”。随着“橡胶产权改革”^①的完成,橡胶收益归村民独享。双村2009年人均年纯收入为5688元,2011年达到8255元,远远超过M县的平均水平。

自由市场社会中资本的扩张与市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从双村的案例可以看出,“橡胶村”产业最初的形成并不是自由市场扩张所导致的,而是在“政经一体化”格局中政府主导的结果。这种政经一体化的逻辑在于,政府和企业、权力与资本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在“绿色产业”发展初期,在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政府成为绿色产业实际的推行主体,甚至参与公司的运营,获取经济利益。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市场逐渐取代政府,资

本逻辑开始成为主导。资本通过“自然资本化”的方式实现增殖,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地被吸收到经济体中进行消耗。传统时期具有丰富文化与社会意义的森林、河流、土地等“人化自然”被“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地建构为单一自然资源。与已有研究表明工业污染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当地居民则成为经济、环境决策的局外人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24]的情况不同,经济作物种植中双村村民与政府、企业三方联合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踏上了施耐博格所谓的“生产的跑步机”的运动机制上,环境衰退是跑步机运行的必然结果。

现代“市场导向”农业替代了传统的以满足温饱为目标“生存导向”农业。这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农业类型。其一,市场导向农业将农民的生产纳入市场体系中,生产本地化,消费外地化,外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直接控制农民的生产。市场化中的农民计算“投入—产出”比,追求收益最大化。物种的单一化以及为保证最大量产出的化学肥料量、农药的使用成为必然。市场导向农业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温饱农业有明显的区别。其二,与生产市场化相一致的是农民生活市场化。市场逻辑瓦解了传统意义上农村村民的互助交往模式,随之而来的是社区关系的疏远、信任感缺失以及关系的金钱化等。农民开始独自面对市场,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生活成本,陷入了“生产—消费”的循环陷阱^[25]。M县的生态危机则是自由市场将自然资源变为虚拟商品的“脱嵌”机制的必然结果:(1)物种单一化、水资源枯竭。经济价值低的杂木树被单一化的经济林木取代,橡胶村、咖啡村、茶叶村不断出现。由于橡胶、桉树不具有保水功能,造成附近

① 胶农出一一定的资金给橡胶公司和后方基地,买断胶树所有权。买断之前,胶农产胶后必须要将橡胶出售给固定的橡胶公司。买断之后,橡胶可以自由出售。橡胶产权改革后,胶农收益显著提高。

的小箐沟、小溪干涸,当地主要河流南马河径流量减小了三分之二,灌溉时期村寨之间“争水”事件频发,双村的几个寨子甚至出现饮用水困难。(2)化肥、农药大量使用。为了追求持续高产量,在科学管理的话语背景下,化肥、农药使用量、使用频率达到极限。一棵橡胶树每年需要施农家肥与化肥约15公斤,打除草剂2次,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

六、结语

M县社会和生态的急剧变迁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引致的“断裂”多样的形式和严峻的生态后果。1949年以来,外来具有强大制度合理性、技术合理性和发展合理性的现代性力量不断改造农村。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下,权力、知识与资本实现合谋。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消解了传统地方社会规范和文化,植入一套以产权理论、科层化管理为指导的现代管理制度,造成森林使用的严重社会失范;以单纯提高农业产量为目标的汉区农耕知识和高科技农业知识的两次根本性替代,改变了传统的“生态嵌入”^[26]农业中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关系,而高科技农业的弊端则一览无遗;市场化下的经济作物规模化生产将自然建构为单一的服务于生产的资源,农民生产市场化和生活市场化合力重塑自然。可以看出,现代性导致环境问题具有双重逻辑:一方面,现代性通过对传统的排斥,使得与环境相和谐的地方传统近乎丢失,环境问题与“传统的逝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固有的弊端及其与生态的矛盾体现出来。现代技术、市场体系总体上是不利于自然环境的。以“自然资本化”为前提的生产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所以,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

农村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农民的角色需要加以重视。1949年以来,国家—政府毫无疑问主导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赶超型现代化和发展的目标下,市场、科技成为其运用的主要手段。现代化下的农民态度与行为体现矛盾的逻辑。一方面,遵循“生存伦理”与“风险最优”的农民最初被动地接受国家的现代化改造,甚至抗拒现代化,这体现了斯科特式“支配—抵抗”^[27]的一般模式;另一方面,当“成本—收益”思维和市场逻辑日益侵蚀农民,传统农民无可避免地“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发展经济和生态保护的博弈

中,生态成为被异化“农民”生产行为的牺牲品。

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遭到“现代”贬低的“传统”的价值凸现出来。通过对“发展”的反思,我们意识到“传统”不再意味着愚昧、无知和落后。挖掘传统的地方生态知识、“人—自然”关系认知以及传统的生态伦理,探讨如何与现代科技、生活方式相结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缝合断裂的有效方法。

致谢:感谢导师陈阿江教授、罗亚娟博士在调查和论文写作中的指导和帮助。感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 David Pellow 教授、边燕杰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 朱晓阳,谭颖. 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J]. 社会学研究,2010(4):175-198.
- [2] 郑杭生. 警惕“类发展困境”[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3):16-20.
- [3]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4-6.
- [4] 耿言虎. 三维“断裂”:城郊村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74-80.
- [5] Schnaiberg A, Pellow D, Weinberg A. *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Mol, and Buttel (eds), *Research in Social Problems and Public Policy* [M].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002:15-32.
- [6] Molotch Harvey.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2): 309-332.
- [7] JB 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2):366-405.
- [8]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7-11.
- [9]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257.
- [10]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刚,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59-66.
- [11] Escobar, Arturo. After Nature: 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9(1):1-30.
- [12] 张玉林.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J]. 探索与争鸣,2006(5):26-28.
- [13] Raymond Murphy. *Rationality And Nature: A Sociological*

- Inquiry Into A Changing Relationship*[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3-106.
- [14] 巴里 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 自然人和技术[M]. 侯文蕙,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11-140.
- [15] 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1): 62-69.
- [16]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34.
- [17] Ramachandra Guha. *The Unquiet Woods: Ecological Change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Himalay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61.
- [18]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 1968(3859): 1243-1248.
- [19] 陈阿江.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 学海, 2007(1): 36-41.
- [20] Katon B, Knox A, Meinzen-Dick R. Collective Ac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Devol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J]. *Policy Brief*, 2001(2): 2-40.
- [21] Berkes F, Colding J, Folke C.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Adaptive Management[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0(5): 1251-1262.
- [22] 尹绍亭.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248-249.
- [23] 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 陈晓径,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8-30.
- [24] 顾金土. 乡村工业污染的社会机制研究[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25] 王靖. 国家、市场与牧民生计转变: 草原生态问题的阐释[J]. 天府新论, 2012(5): 96-99.
- [26] Gail Whiteman, William H. Cooper. Ecological Embeddednes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6): 1265-1282.
- [27] 詹姆斯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33-56.

(责任编辑: 李良木)

Modernity and Rural Ecological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ntinuity” (1949—2012) and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our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GENG Yanh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modernity since 1949 and the “discontinui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ecological crisis. Using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M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the present paper delved into the socia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entralized” modern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has replaced the local community autonomy management system relying on traditional social norms and beliefs and taboos, that the agricultural expertise from the Han ethnic areas and modern science knowledge in pursuit of production output as the single goal have replaced the vernacular agricultural know-how, and that the market-oriented green industry has replaced the subsistence-oriented agriculture from the logic of capitalization of the nature. The above three factor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ecological crisis. We need to deeply rethink the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ity and discontinuity.

Key words: Modernity; Discontinuity; Ecological Crisis; Folk Knowledge; Capitalization of the Nature.